



大树的命运

□朱霁云

对绿色生命的情有独钟,似乎与生俱来,我的“情窦”开窍于绿树,我的审美始于绿树,从我知事便敬畏和钟情于一切绿树。它们春的葳蕤、夏的繁茂、秋的尔雅、冬的娴静,尽收眼底,令我心动。而漫染沧桑之绿的树,我岂止欣赏,更多的是敬重、敬畏。它们是一地悠久的见证、文明的标志、独到的风景、生命的搏动。那叶、那枝、那果,那形、那色、那姿,凝聚天地之精华、日月之光辉、人文之脉搏。它们的所在,便有诗歌、便有密语、便有吟唱。

因之,城市拆迁改造中的大树,总牵着我的目光、系着我的关注、结着我的情缘。我可以勾画出这些年在岁月的流逝中,人们对那些大树漠然——关切——敬爱的轨迹。

原如皋中学饭堂、老关帝庙前,有两棵百年银杏,20世纪60年代我在如中上学时,就已斑驳虬结,高耸天际了。1995年,如皋市区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改造。当时我在市委办公室工作,正在牵头起草“打通海阳北路,改造建设北大门”的有关报告。我虽多番努力,那

两棵古银杏终究灰飞烟灭。过去时日越久,想起越是心痛。旧话重提,无意追责什么人,只是窥见时代抛下的见识和观念的无形之罩,曾经让我们愚昧,例如消失的大树,例如我们的古钟楼在众人的鼓号中被逼迫推倒。既然我们已经聪明起来,便不能重蹈覆辙。

时过6年,内外城河整治及两岸改造拉开序幕。当时的市棉麻公司位于现安定广场西南边,“县委诞生地”纪念碑所在的广场周围,列入拆迁规划。

其时我在市人事局工作,去棉麻公司办事时,见他们正忙于把院子里的树木挖走,有一棵铺天盖地的巨大雪松也要搬挖。我看在眼里,心生焦虑。晚上开拆迁动员大会,我在会场上找到当时的分管领导,说:“棉麻公司的大雪松,全市没有比它更大更老的,修路砌墙容易,百年大树长成不易,哪怕规划稍作调整,请您千方百计保留下来!”

他没有犹豫,当即说:“应该应该!好在你提醒。”随即在会场叫来棉麻公司经理,说:“小树可以搬走,雪松不能动,由市

里来处理。”并要他们用木栅栏围好。同时,要求规划部门保护雪松。此后,规划部门在道路划线时,特意避开了雪松,让它位于广场边上,并对根部做了维护。

现在,这棵古老的雪松根深叶茂,冠盖如云,终年苍翠、生机勃发,枝叶铭记着决策者的明智、躯干汇交着观念的前行。

保护大树名木,国内外都有典范,演绎了许多修路让树、建房让树的故事,这些也逐步在我们这里演绎成事实。雪松故事的四年以后,“全面建设绿色如皋,全力打造生态家园”深入人心,市有关部门联合调查并公布了我市73株百年古树,重视保护大树古树,成为领导、部门和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。在这样的氛围中,我无需再为大树的保护去找领导鼓与呼,只须欣然观赏着一处处被保护下来的大树古树,体悟着它们赋予人类的温馨和遐想。

如师门前的马路,为10株古龙柏“瘦身”;门前东南角,一处两棵大冬青、一处两棵古槐树,道路为它们让出一席之地,根部石围宁可凸在路道。集贤桥北河边两侧和通城桥南侧,两大片几十年的水杉林,没有

因为它们与近旁树种的不一致而被砍伐,完整地得到保护、水杉林傲然排列,蔚为壮观,春夏苍翠,秋冬金黄,风景那边独好。颐园小区南大门,为百年银杏让出了道路,为病危的老树搭架维护、输液滋養。泰华大酒店背后停车场的一棵大银杏,车位为它让开,虽然看起来孤独,但是蓬勃。曾经破败的海月寺内,两棵百年银杏生机盎然,一片葱茏。健康桥南侧,新修的三岔路,为几棵大树留下了一片天地……

绿树与时代共处,与人性共存。它们是有灵性的,是有记忆的。在毁林造田的年代,它们无端罹难;在“读书无用”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,它们同样承受漠视。春回大地,它们和人们一起身心起舞;在城市化的进程中,它们伴随绿色环保观念从懵懂到觉醒再到自觉的步履,走向从容、年轻,走向生机焕发。“古树春风人,阳和太迟。莫言生意尽,更引万年枝。”时代赋予大树幸运,美满。我为一处又一处的大树在拆迁改造中安然无恙、备受呵护而庆幸喝彩;为一棵又一棵的大树,给新的城市增光添彩而欢欣鼓舞!



心愿也会过期

□马亚伟

玲姐是我的前同事,比我大很多,当年算是单位的元老级人物。七年前,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。她性格开朗,心里有话存不住,大家都很欢迎她。

玲姐经常会在繁忙的工作之后捶着腰说:“唉!现在忙死了,我真想赶紧退休。退了休,我有好多梦想要实现呢!不对,应该是心愿,梦想这个词儿太夸大了,适合年轻人追梦时用,我的那些想法只能算是心愿。比如,退了休我要跟老公一起来一次周游全国,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;还有,我年轻时特别喜欢画画,这么多年都没拿起过画笔,退了休我要重新学画,说不定还会成为中国的摩西奶奶呢;还有呢,我还想组织一场同学聚会,一定要把所有的同学都叫来,看看大家都老成什么样子了……”

玲姐每每说起自己的退休心愿,都是一脸兴奋的样子。她说她的退休心愿清单上,已经密密麻麻写了十多条了。等退休有了时间,会逐一完成这些心愿,否则想来可能会遗憾终生。

后来我调动工作,我们联系少了。

前几天我在街上偶遇玲姐,得知她已

经退休两年了。我们俩感慨了一番岁月匆匆,很自然聊到彼此的境况。我忽然想起当年她说的那些心愿,于是笑着问起。玲姐被我这样一问,脸上掠过一丝尴尬,继而又露出释然的样子。她说,退休心愿清单现在还留着呢,不过几乎一样都没实现。当年想去各地旅游,可退了休才发现,体力已经大不如从前,尤其是她的膝盖出了问题,不能长时间走路;而且退休以后好像完全没了当年的心气儿,觉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之类的事是年轻人做的;再加上后来疫情影响,根本没出过门,甚至连附近的风景名胜区都没去过。说到退休后学画画的事,玲姐又叹了口气:“唉,都是因为没心气儿了,根本没学。同学聚会也没组织,想做的事都没做。当年壮志凌云,没想到退了休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。”

玲姐告诉我,她现在帮儿子带孙子,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那些心愿,已经过期了,也就不再想了。玲姐虽然表现得释然,但我却能察觉到她内心隐藏的失落。这些心愿没完成,她是不是觉得“遗憾终生”呢?时过境迁,心愿过期,当年那个满心憧憬的

人,似乎也在岁月匆匆中老得没有追梦的力气了。

这未尝不是人生的一大憾事。想想这一生,心愿真有保质期,我们应该趁着心愿还未过期,努力去实现它。你应该有这样体验:刚刚从心底萌生出来的心愿,仿佛新出炉的热面包一样,散发着诱人的味道。那些心愿,想起来都让人心潮澎湃,不仅充满了激情,也给生活注入了活力。如果能趁着这股热情去实现心愿,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就说玲姐吧,当年她的工作虽然忙,但也不是完全抽不出时间来完成心愿。想旅游,可以趁着假期去;想画画,可以立马拿起画笔;想组织同学聚会,可即刻付诸行动……有一股热情推动着,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心愿的完成。但一味往后推,推到最后,那股子劲儿过去了,万事蹉跎,终成遗憾。

张爱玲说:“出名要趁早呀!来得太晚的话,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”我觉得完成心愿也是如此,有什么想法及早实现,太晚的话,心愿过期,即使勉强实现,满足感也没那么痛快了。

“低情商”老师

□朱辉

参加过各个阶段同学聚会,席间聊起遥远的三四十年前,大家能够记得名字的老师寥寥无几,至于能记得“形状”的就更少了。总结起来,能让学生记得一辈子的老师,具有的共同点是现在所谓的“情商低”、一肚子不合时宜。我的初中班主任杨老师就是其中典型代表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,人们在服饰上已经开始百花齐放,杨老师却总是穿着中山装,夏天也是长裤、衬衣,风纪扣扣得严严的,绝无走光之可能。“站如松,坐如钟,行如风,卧如弓”,杨老师如此要求我们,实在没人能做到,但他一直严格按这个标准规范自己日常举止。

杨老师是语文老师,他主张每天写日记,说虽然这很难坚持,但可以培养自律性。日记具有私密性,他却要求大家每星期上交一次,由他审阅。这样一来,日记就变了味,然而却变得有了一些实用性。比如弱势的同学被欺负了,杨老师第一时间

就能知道,会约谈相关同学,情节严重者请家长。有了日记的威慑,班上三年间没发生过严重的霸凌事件。大家有什么想法,当面往往不好对杨老师说,但通过日记可以达成有效沟通。

有一次,学校组织大扫除。原本计划半天完成,然而我们清扫完目标区域,临时又加了任务。到了下午,又加了一次任务,一直干到傍晚。我在日记里对此表达了不满,认为学校不应该出尔反尔,给学生树立不好的榜样。杨老师看了日记深以为然,跑去向校长反映。出于对学生的保护,他只是说一些同学提出了意见,但没说具体名字。可是回到班级,却点名道姓表扬了我。当时我有些恼火,这么多人知道,校长就不很快知道了?杨老师真够幼稚的。然而我并没有迎来什么不良后果,现在想想,或许杨老师信任自己的学生,相信他教的学生中绝无两面三刀的小人。

杨老师特立独行,可想而知在注重人

际关系的环境下,在学校一直属于孤家寡人,世俗眼光看来就是混得不怎么好。好在他后来考上了研究生,在当年重文凭、高学历人才稀缺的背景下,再怎么也不会过得很差了。像他这样的老师,我学生时期各阶段都遇过,全校往往就那么一两个,能遇上真是天大的福报。

冯道在《荣枯鉴》中写道:“人慕君子,行则小人,君子难为也。”一晃如今我们都年近花甲,同学中似乎还没出过杨老师这类人物。不过即便平日里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的高情商同学,回忆往昔都很敬佩这类老师。窃以为只要仍仰慕君子,就算不得真小人,因为心中那点暗夜微光并未熄灭。至少知善恶、能辨美丑。身边有些人总在宣扬当坏人才能吃香喝辣,这类恶之花,才是无可救药,当远离之。

人生海海,回想此生遇到的几位“低情商”老师,他们就像灯塔,让我们不至于偏离航线。



夏蒋村二轮车队

□任寿

解放前后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海安东乡丁所集镇北首的夏蒋村有支“二轮车”队,在丁所、李堡一带特别地惹人注目。这支队伍接客送人、贩海货、贩粮油、贩家禽,样样都来得。在六七十年代的农闲时期,他们送客一趟虽只有二三毛钱,但一天挣个块八角钱的,也解决了一家四五口的生计。

夏蒋村紧靠丁所集镇,村里的三队、四队、五队、六队、七队都靠在公路边上,买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出门很方便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,丁所集镇及夏蒋村就通了公路,聪明的夏蒋人感到商机来了,家庭条件好的人家就买了自行车外出做点小本生意。我的外婆家住在夏蒋五队,几个舅舅很早就买了自行车到丁所轮船码头、车站等地接客送人。

据我的一个堂舅说,20世纪60年代买辆旧自行车只要几十块钱,回来后加固链条、齿轮、轮胎,辐条换成粗钢丝,后面用两根竹片延伸座位的长度,上面再加上一个棉花布垫,让乘客坐得舒服一点。这样不用办任何手续就能上路挣点外快了。我有一个表兄十三四岁就到丁所轮船码头做起了接客送人的生意。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期,丁所轮船码头十分繁忙,有开南通、海安、掘港、溱潼、大中集等地的客运轮船。那时,有南通知青放到海安角斜、沿口、苏州、无锡的知青下放到东台唐洋、三仓、新街等地,他们都是从南通乘船到丁所,再从丁所转坐“二轮车”去角斜、沿口、唐洋、三仓、新街。夏蒋村踏二轮车的就在轮船码头、车站等地等待客人。客班船没到的时候,他们在轮船码头西侧的窑房旁边打牌消磨时间。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汽笛声响起,客班船到了,他们都簇拥到码头上,帮客人拎行李、背挎包,总希望能接到个要走远路的,比如到新街、角斜等地的,一趟跑下来就有四到六毛钱的收入,送到三仓能弄到块把钱,回头有客,收入就更加可观了。

70年代中后期,由于知青逐步回城,以及公路客运班次的增多,乘轮船的人少了,二轮车送客的生意也难做了。夏蒋村人便把目光转向“踏货”的方向。如到如东的靖海、栟茶等地将刚出海的文蛤用自行车运到海安、曲塘、姜堰等地农贸市场销售或者直接送到饭店。当时,海安东乡广种三麦、蚕豆、玉米、棉花等植物,水田面积较少,农民很少吃到大米饭。于是,夏蒋村踏二轮车的人就到农户家中收购蚕豆,运到泰县苏陈等地换取大米,从中赚取差价,一来一去100多公里,车上还载着200多斤粮食,要是自行车出了故障,坏在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地方,其“惨象”可想而知。70年代后期,市场逐步放开,夏蒋村专门贩米的人多了。他们将里下河地区的大米贩到海安东乡丁所、李堡、角斜等地销售,活跃了农村商品市场。当然也有些心术不正的人想从中多赚些差价,将大米倒在家中的塑料纸上再掺水拌和,增加重量,多赚一点黑心钞票。80年代初,海安东乡水稻种植面积扩大,大米的生意难做了,夏蒋村人又将目光转移到贩运禽蛋、家禽上了,将海安的鸡蛋、三黄鸡运到上海、嘉定等地销售。80年代的海安有“百万雄鸡下江南”之说,这下江南的运输队中有不少的就是夏蒋村人。那年头,从丁所大桥到夏蒋村的公路上边到处都是鸡毛飞舞,邻近的李堡街上贩蒜头的人又特别多,农贸市场处处蒜皮飘飘。人们开玩笑说,丁所的鸡毛、李堡的蒜皮,加在一起就是“鸡毛蒜皮”成语的来历了。

90年代后,夏蒋村的二轮车队也鸟枪换炮了,先是重庆嘉陵轻骑,后是“幸福250”摩托,再后来又进化成手扶拖拉机、方向盘式拖拉机、农用货车、卡车等,主要贩运家禽、禽蛋等,销售市场也由上海,扩展到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宜兴等地。二轮车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失了。

零糖社交

□武小芳

小时候,南大街老巷口的糖人摊是我最爱去的地方。刘师傅的手粗大得像老树的根节,总沾着洗不掉的糖渍。他舀一勺糖浆,手腕凌空转动,眨眼间,凤凰展翅、金鱼摆尾便凝在石板上。糖人送来时,还是温热的,含进嘴里,糖丝甜得钻心。

甜东西吃多了,牙就坏了。夜里疼醒,母亲用棉花蘸取丁香油敷在我的痛处。“糖吃多了,总是要还的。”她这么劝说。可天一亮,我又擦着早餐钱去找刘师傅。

二十八岁那年,我在城南开了家服装店。生意刚起步,学人攀关系。茶座、饭局、聚会,我一个个赶场。为这些社交,我不断打乱自己的正常生活,推了陪母亲去医院复查,误了店里的进货,连儿子学校的亲子日,我也错过。

直到三年后的一个雨天,上游工厂倒闭,断了货源。我想到社交场上的“好姐妹”。打给李姐,说在度假;找小张,在通话中;跑到王太太家,说不方便。我僵在雨里,冷得直哆嗦。

意料之外,鲜少联系的小沐赶来。她连伞都没撑,头发全淋透了,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的信封,塞到我手里,“姐,我攒的,不多,你先拿着”。后来,我才知道,那是她准备报考技能培训的学费。

雨停后,我走到巷口,刘师傅的糖人摊早已不在。回到家,我把糖倒进锅里,开小火慢慢熬。看着白色的糖浆融成琥珀色浆,空气中弥漫着腻人的甜香。我没有关火,任它从琥珀变成焦黄,最后凝结成一坨冒着褐烟且死死扒住锅底的焦黑硬块,呛人的煳味飘满厨房。我木头般盯着那锅炭似糖浆,心里某个部分似乎也跟着熬干了。

我尝试推掉不必要的聚会。起初很难,拒绝时,手心都会冒汗。但几次之后,就习惯了。腾出的时间,能陪孩子写写字,挽着母亲逛逛街,或者窝在沙发,读完一本喜欢的书。

某个春末午后,阳光好得让人发懒。我推出那辆闲置多年的自行车,擦净灰,给链条上了油。骑上去时,咯吱作响。风迎面扑来,心里堵着的那团东西,也一点点随风消散。

因为喜欢骑车,我加入了骑行俱乐部。里面的陈姐总随身携带薄荷糖,谁上坡骑得吃力,她就掏出一颗递过来,含在嘴里,丝丝凉意顺着喉咙往下滑,刚累得发紧的小腿,似乎轻了许多。她常说,在这里,很舒心。骑不动,有人推一把,不用琢磨怎么还人情;不必化精致的妆容,汗湿的衣领也没人在意,就连沉默,都不觉得尴尬。

生意好转后,那些消失的人又回来了,依旧姐长妹短、约茶约饭。有空我也去,但坐一会儿就走。李姐拉着我的手说:“以前你总抢着买单,现在怎么生分了。”我笑笑,不多解释。

前几日,约小沐沿濠河骑行,骑到西岸边的老柳树下歇息。她掏出保温杯,倒出自制的桂花茶,说道:“前阵去桂花岛摘的,茶里加了点青麦仁。”她望着河面,“最近,我也推了好多应酬,喜欢现在这样,踏实。”

我喝着茶点头。嗯,这样安静地坐着,就很美好。风裹着草木香拂过,对岸文峰塔的影子晃在水里。我们不用着急找话题,连呼吸都慢了下来。没有刻意讨好,没有多余负担。这份松弛的默契,就是零糖社交最好的模样。它不是寡淡,而是把甜留给真心的舒适,像河面的碎光,安稳且刚刚好。